

农村环境问题的三重维度

——义村个案研究

蒋 培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摘 要:农村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转型期间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保护农村环境,治理农村污染,不仅要注重技术、法律、制度方面的完善,更需要用社会学的视角从农村社会内部的政治资源、经济利益、传统文化三重维度的变化中寻找原因与可能的切入点。以义村为个案,通过实证调查考察了当前农村的环境状况,并认识到农村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农村环境问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义村;环境问题;文化断裂;经济利益;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4-0035-05

十八大报告首次列专章来阐述生态文明,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农村环境保护问题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成为环境保护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污染企业实行搬迁,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农业产业化加速发展等,使得农村环境污染问题逐渐被摆上议事日程。但是,直到今天,农村环境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了很多的新问题与新矛盾,农村环境问题治理将成为“十二五”期间亟待攻克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文献回顾及评述

当前,学术界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除了自然科学领域注重农村环境污染监测评估与课题研究之外,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也开始重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就现有的研究情况而言,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健全。在法律体系、制度方面,缺乏基干法律或专门性法律和法规;立法滞后,立法存在空白;立法不够配套;立

法内容不够适应农村环境保护的特点,等等^[1]。第二,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影响。有学者提出当前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深层次根源是城乡不平等造成的^[2],城乡二元分治的模式对农村环境保护产生了不利影响。首先,城乡二元体制降低了农村对环境的需求。由于农村相比于城市更关注经济发展与提高收入,对环境的关注减少。其次,城乡二元体制削弱了农村对环境的治理能力。农村因为资源、技术的缺乏,在环境保护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城乡环境差距不断扩大^[3]。第三,农村环境保护经济投入力度不足。目前,全国大部分行政村普遍负债,国家公共财政支出中尚没有农村环境保护的专项基金,银行、企业和社会私人资金也很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农村环境保护资金非常匮乏^[4]。第四,农村环境教育不足与农民自身意识淡薄。我国环境教育起步较晚,农民的环境知识与环境信息严重缺乏。同时,农民自身环境意识淡薄,对自身影响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缺乏自我约束^[4]。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农村环境保护的确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不足,需要从法律法规、社会体制、经济投入、环境教育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来逐步改善农村的环境状况。从当前的研究内容来看,更关注农村环境问题出现的外在物质性因素,却很少用社会学

收稿日期:2013-03-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SH021);浙江省生态文化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项目(ZAU201312);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学子项目(13ZHFD05)

作者简介:蒋培(1987—),男,浙江余杭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环境社会学与环境法学研究。

视角来探讨农村社会中非物质性社会文化逻辑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影响。从社会学角度来关注农村环境主要偏重于从社会结构、社会规范、话语权力、环境意识、经济理性、现代性等方面阐释环境污染的形成机制,如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传统环保规范失灵、农民环境意识薄弱、现代化性的侵袭等。

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利用历史性分析的方法来关注农村社会结构与文化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下是如何影响农村环境问题的。基于义村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在农村环境变迁过程中,农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断裂,经济利益的先行,话语权霸占等现象对农村环境状况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案例村及其环境问题

在社会转型期间,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等发生极大地变化,如何适应现代生活,如何融入现代社会等问题摆在了农民面前。农民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还没有完全搞懂现代化的含义,就已经被社会戴上了“现代化”帽子,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也在短时间内被抛之脑后。随之而来的是各类社会问题,如社会文化不适应,农村环境状况恶化,经济利益崇拜化等。本文选取了在现代化条件下环境状况发生恶化的一个典型村——义村^①作为研究个案,来深入剖析农村环境问题背后的成因。义村位于浙江省内,全村现有 161 户,552 人,水田 19.67 hm²,山地 327.7 hm²。产业主要涉及农业、林业、畜牧业、手工业,尤其是山核桃产业的发展已成为该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义村在历史上位列当地四大名村之一,历来属办学圣地,教育发达,以忠孝文化著称,被称为“忠孝文化第一村”。

2012 年 7—8 月,2013 年 4 月,笔者及其课题组成员在义村进行了多次调研。课题组主要采用了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问卷法以及口述史的方法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获取了义村近几年的村委会议记录以及村志等资料。访谈对象主要是中老年人,也有少量年轻人,以及村中现任村干部、前任村干部等,累计访谈人数超过 30 人。本文正是基于以上所收集的资料来展开论述。

义村虽属山区,但村中水系却很发达,村前有杨溪流过,村中也有一条小溪穿过,水田中沟渠网络密集,各路水系相互贯通。村庄周围是山林,海拔在 200~300 m。按照中国风水学说,义村处于“背靠山,面朝水”的极佳风水位置。村中现有山核桃加工厂 5 家,木材加工厂 1 家,分布情况见图 1。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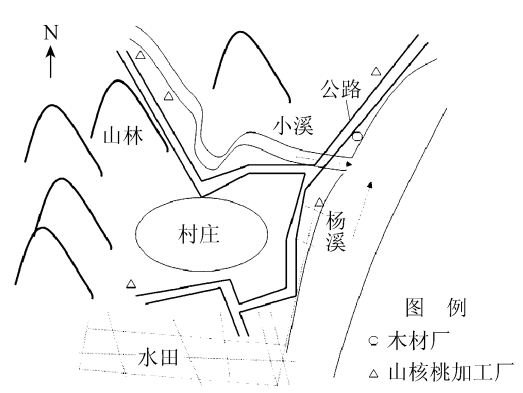


图 1 义村地理位置分布图

关注的是,在村庄中间主要是一些古宅民居,现已受到保护,新建的住宅主要分布在外围与马路边上。

环境的变化既是自然界演变的结果,也是人类活动影响的结果^[5]。在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义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主要包括:

1. 工业污染

义村中的工厂主要是山核桃加工厂与木材加工厂,都是本村人自己经营的。木材加工厂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木材废料漂在水面上,对水体造成很大污染。作为本村最大的经济收入来源的山核桃加工厂遍布于整个村庄,现有 5 家之多,而且都沿河和水田分布。山核桃加工过程中有一道“去麻”的工序,需要在其中加入化学添加剂,产生的水体呈现红色,排入水体会产生严重水体污染。每年自 9—10 月份之后,山核桃加工厂就开始大量生产,废水直接排入水体中。据实地访谈得知,每到那时村中的水体都呈红色,不要说饮用水,就连洗衣服都不行。像这样的污染状况一直要持续到次年 3—4 月份。

2. 农业污染与自然灾害

①生态林减少。由于山核桃的经济效益较好,大量的生态林被砍伐,种上了山核桃树苗,山核桃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到 2011 年底,全村山核桃林种植面积超过 133 hm²。在新中国成立前全村山核桃产量只有 1~2 t,到了 2006 年全村总产量为 35 t 左右,而到了 2011 年全村产量在 100 余 t。多的种植户有几公顷,一年可以收获 1 000~2 000 kg。但随之而来的是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现象频繁出现,生物多样性也大大减少,打破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②农业面源污染。为了提高山核桃的产量,大量的农药与化肥被使用,在雨水的冲刷之下,流入河流中。同样,水田中也使用大量的农药和化肥。农业面源污染成为主要污染源之一。③土壤污染。在山核桃树林中使用大量的化肥,不仅会造成农业

^①按照学术规范,对案例村进行了处理,采用了学名。

面源污染,同时对土壤也产生很大影响,土壤板结严重,植物树根逐渐腐烂,短期内难以恢复。

3. 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污染

虽然有垃圾回收箱,但是大量生活垃圾堆放在路边、河边与山林中,路上还堆放着猪粪,散发着恶臭,对周边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村民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包括人尿、粪便等,只经过简单的沉淀过滤,直接排入水体中去,增加了水体的负担。

三、传统文化断裂

环境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危机。林恩·怀特指出“我们对生态的所为依赖于我们关于‘人——自然’关系的思想”,而基督教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提倡对自然的征服态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6]。同样,在义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断裂对环境状况有着直接的影响。反思环境问题需要寻找文化根源中的困境。

1. 忠孝文化的断裂

忠孝文化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强调不仅要对父母孝敬,对长辈尊重,对国家的忠诚,同时还需要有一种“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恻隐之心。仁有亲近的意思,孟子主张要亲近自己的亲人,然后把爱心推出去,扩展开来,怜爱珍惜万物。孟子的恩惠对象包含外物,这用今天的话来讲,他的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包括外部世界。这种思想,到了汉唐更为明确。郑玄在给孟子这段话作注释的时候说:“仁,爱人以及物。”唐代贾公彦进一步解释说:“仁者内善于心,外及于物。”“物”包括禽兽、草木。爱,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7]。

义村自宋代以来就被称之为忠孝文化村,村内有二十四孝之一的陈斗龙的祠堂,还有忠臣韩世忠的陵墓,忠孝文化的根基深厚。在最近几年,义村还被市政府冠以“忠孝文化第一村”的荣誉,具有一定知名度。但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忠孝文化作用与意义只停留在表面,仅作为义村的形象工程与宣传工具,为的是能够得到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助。忠孝文化原有的仪式都已失传,难以有效地整合起义村村民的忠孝文化思想,更难以对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相距很远。在村中仍然存在不孝敬父母、不尊重长辈、邻里纠纷、村民与村干部对立的现象。在义村,忠孝文化已经出现了断裂。这可以通过访谈笔录来予以验证。

[陈大妈,60岁,家中有6口人,大儿子作油漆工,小儿子在德国当厨师。家教很好,在村内享有口碑]我们村忠孝文化的宣传活动主要是通过中老年妇女跳跳排舞来进行的,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关键

还是靠自己教育。我们家比较注重家庭教育,比较严格。家庭内部关系较好,家庭和睦,婆媳之间关系很好。但本村的婆媳关系也有很多不好的,外地人(媳妇)多于本村人,相处起来比较难。村里也存在不孝的家庭,也有儿子打母亲的情况存在。(2012年7月20日访谈内容)

正是由于义村忠孝文化实质内容早已发生改变,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爱人、爱物的恻隐之心也发生了改变,随着现代化过程都已被异化。各类自然资源与环境只是成为村民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对象与场所,原有那种爱人以及物的情感荡然无存。可以说,忠孝文化的断裂使得义村村民的思想观念发生转变,与现代化冲击之下的普通社会人群并无差异,这也是义村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之一。

2. 传统村落规范的丧失

迪尔凯姆将由于社会分工发展速度过快而引起社会结构剧烈变化,旧的共同价值规范失去了在社会联系与社会协调中的作用,而新的道德规范又没有及时产生而引起的社会状态称为“失范”^[8]。在现代村落中,传统的规范失去了原有的控制力,而新的社会规范和新的生态伦理或者没有产生或者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水域污染这类社会失范现象的产生就不可避免^[9]。在义村,传统文化规范的丧失有客观原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纷纷离开农村,走向城市从事制造业生产或服务业工作。他们接触到了城市中多样的文化,逐渐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把传统村落的行为规范抛弃了。等到他们重新回到农村生活或工作时,原有的生活方式早已发生变化,讲究的是更多的物质消费、需求与索取。于是,农村中生活垃圾逐渐开始增多,坐式马桶开始在农村流行,农药、化肥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各类皮革制品、塑料制品也开始泛滥,而勤俭节约、保护环境意识却越来越淡薄。

在传统村落社会中,长辈或村中舆论谴责是最为严厉的规训手段,有效地制止了各类违规或不合村落规范的行为,并能够在传统农村生活中形成勤俭、节约等品质,充分利用各类农家肥与生活垃圾,保持农村生产生活的平稳和谐状态。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传统规范逐渐失去了威力,村落中出现了各类失范现象。在义村调查期间,有两户农家因为土地纠纷的问题,相互之间产生了怨恨。其中一户为了报复另一户,在他家门前的马路上倒放垃圾与猪粪,在村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是,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村中舆论的谴责,都难以使其收敛,仍旧时常把垃圾倒放在人家门口的马路上。正是农村传统

规范的失效,对各类破坏周边环境的行为缺乏约束与规制,农村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农村环境问题不仅表现为外源污染,还表现在内生污染上,村民原有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水塘、小溪、小河、田地、马路等都成了人们纳污的地方,污染状况越来越严重,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感情却越来越疏远。

四、经济利益先行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等人的一项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呈倒 U 型关系。由于它同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 U 型关系非常相似,故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0]。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作如下解释:在经济起步阶段,环境污染将随着经济增长而加重,在经济发达阶段,环境污染则随着经济增长而减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代表的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先经济,后环境”的发展模式,在当今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也同样遵循相同的路径。义村的经济的发展也带有明显这样的痕迹。

1. “绿色”的假象

随着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临安山核桃的品牌知名度也逐渐扩大,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成倍增加。义村作为临安山核桃的主要产地,近年来山核桃产量也不断增加。为了提高山核桃的产量,农民砍伐了大量的生态公益林,都种上了山核桃树苗。所以,虽然是同样的绿色树木,但绿色背后的意义已发生了变化。首先,经济林取代了公益林,经济利益超过了环境效益。种上山核桃树之后,由于采摘要求,山核桃树下寸草不留,光秃秃的,等到下雨季节,水土流失与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较大。其次,村民为了追求产量,山核桃树的农药、化肥使用量也在不断增加,农业面源污染越来越严重,土壤污染情况也令人担忧。最后,由于大面积的开发山地,种植山核桃树,导致原有森林植物群落的单一化,生物多样性大大减少,甚至可能对地方的局部气候造成影响。

从以上可以看出,义村山核桃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产量也在逐年递增,但这种“绿色”却是一种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环境状况的假象。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义村村民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山核桃的产量,而没有考虑到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与生态破坏,选择了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2. 经济“短期综合征”与环境“慢性病”

“环境稍微污染一点,从经济上来说还是划算的。”这样的说辞在日常生活中仍能经常遇到的。经济利益相对环境利益来看,似乎有一种“先天优势”,只有经济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无论是政府

官员还是农村居民,在经济利益面前都犯有“短期综合征”,只顾当前利益,不顾几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可能产生的各类负面影响。经济利益往往被放大和摆在突出位置,而环境利益却经常被忽视和遮蔽在幕后。这样的例子在义村有很多,举其中的两例,一个是上文提到了山核桃的例子,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农民,都不断地扩大山核桃树林面积,同时在树林中使用的化肥与农药的剂量也越来越大,造成了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另一个例子是山核桃加工厂的污水排放问题,有的工厂虽然安装了污水处理池,但经笔者实地调查,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运作起来,因为污水处理设备的运行需要一定的成本,在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条件下,污水处理设备往往处于闲置状态。由此看来,在一般村民与村干部眼中,经济利益远远高于环境利益。

但反之,环境状况得不到关注,各种“慢性病”会逐渐暴露出来而且在义村已经开始出现。水质恶化、土壤板结、自然灾害、身体健康影响、产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已经使义村人意识到环境对于自身的重要性。所以,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对于人类来说都不可或缺,但不要仅仅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视环境状况于不顾,发展经济需要从价值观念上逐渐转型,需要意识到环境效益的重要性,能够从长计议。

五、话语霸权

当今中国农村治理的法定模式是村民自治,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但在实际中,农村治理过程中的话语权往往被少数人霸占。正如意大利政治学家莫斯卡曾说过:“在所有社会中——从那些得以简单发展的、刚刚出现文明曙光的社会,直到最发达、最有实力的社会——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11]要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仍需要经过长期的改革与斗争,民主在当前只是对少数人而言。

1. 谁在说话?

那么,现在在义村,谁在说话呢? 中国农村的变迁历史告诉我们,农村的政治权利或者说农村话语权主要掌握在村中的干部与能人手中,而这些干部与能人往往是在当地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或者在某些政治资源、技术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的群体。义村也不例外,在村中“能说话的人”主要是村干部与各类私营企业主,而且很多时候这两种身份往往重合在一起。义村话语权的霸占,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丧失,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话语霸权之下,各类资源被少数人垄断,为自身牟取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其他村民的利益。在话语霸权的情境中,普通农民失去了说话的权利,也失去了反抗权威的力量。

在义村,环境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几家山核桃加工厂排污造成的,而这几家山核桃加工厂的老板都是本村的现任或者前任村干部。所以,虽然工厂排污对村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甚至有部分村民也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义村的山核桃工厂排污现象仍没有根本解决。原因在于村干部等能人往往代表了全村,在环保等部门的检查过程中往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普通的村民却难以得到反映真实情况的机会。话语权掌握在村干部等少数人手里,从他们口中透露出来的问题与信息也已发生了变化,真相却被掩盖住了。

2. 少数人的民主

话语霸权在一定的时候会演变成权力资源的垄断,甚至能够凌驾于国家的制度与法律之上。在义村,曾经有一个告示,告示中呈现的内容值得我们思考。

告 示

广大村民:

义村如来佛是始建于清代的历史文物,是义村百姓非常信仰的佛教古迹,现正在恢复重建中。但在这关键时刻,如来佛上方荷花石帽突然不在原存放处,去向不明。村委会特告示:如是好心人真心保管在那儿,请于××年×月×日×时前主动拿出来或主动与村干部联系,村委会表示欢迎和感谢。超过时间,村委会正式向公安部门作为文物盗窃案件报案,一切均由公安部门查处。

欢迎广大村民主动提供有关线索和信息,村委会可以为您保密,一经查实,给予奖励。

特此告示。

义村村委会
××年×月×日

可以说,义村村委会是最为典型的具有话语霸权的少数人代表。按照国家有关文物保护与刑事法律规定,村集体财产遭受盗窃后,村委会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及时进行查处。但在案例中,义村村委会利用自身的权力违反了法律程序,制订了自己的一套方案来行使权力。这种权力凌驾于法律与制度之上的现象,反映出农村话语权被霸占后权力资源也同时被垄断,少数人的民主代替了大部分人的民主。整个村落掌控在少数人手里,而其他村民的民主权利则被无情地剥夺了。分析其原因:其一,从义村的地理位置来看,处于浙江、安徽两省交界之处,距离县城也有3个小时的车程,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外来文化与思想的干扰比较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村干部等能人的权威被放大,影响力也越大。其二,义村所处的昌西地域,历来政治文化具有很浓的地方性特色,地方政治有较强的自主性,地方政治力量的控制能力较强。

正是这些拥有话语霸权的少数人垄断了地方的政治资源,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的过程中,甚至能够超越相关法律法规。各级立法部门所颁布的环境法律法规在地方实施过程中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对这部分群体来说,遵循法律、制度的规定是表面上的一套说辞,在实际中,则利用各种权力优势与资源网络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把环境成本外部化,转嫁到整个社会中去。

六、结论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转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都发生很大的变迁。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外部环境对农村的影响,更需要理解农村社会内部如何应对冲击与调整自身结构。就以环境问题为例,很多外部的政策、措施、制度等都已经比较完善与健全,但到了农村实际运作中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问题也许就出现在农村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中。农村环境问题治理需要“标本兼治”,才能达到一定效果。

如何才能真正改善农村的整体环境状况呢?也许只有通过弥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断裂;转变急功近利甚至竭泽而渔的价值观念;调控农村政治资源,把话语权赋予广大的农民,才有可能对农村环境问题治理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蔡守秋,吴贤静. 农村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的成就、问题和改进[J]. 当代法学,2009(23):68-76.

[2] 郭琰. 环境正义与中国农村环境问题[J]. 学术论坛,2008(7):38-41.

[3] 李宾,张象枢. 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农村环境问题成因研究[J]. 生态经济,2012(4):172-174.

[4] 易国锋. 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的困境及对策[J]. 农业环境与发展,2007(6):80-83.

[5] 陈阿江. 剧变:中国环境 60 年[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4(4):34-42.

[6] LYNN W.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J]. Science,1967,155(3767):1203-1207.

[7] 乔清举. 儒家生态文化:泽及草木,恩及水土[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206.

[8] 科塞. 社会学思想名家[M]. 石人,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9] 陈阿江. 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东村个案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63-69.

[10] PANAYOTOU T. 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Programme, Working Paper,1993:238.

[11] 加塔诺·莫斯卡. 统治阶级[M]. 贾鹤鹏,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